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主编 匡亚明



惠栋评传

李开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惠 栋 评 传

附 惠周惕、惠士奇评传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惠栋评传

李开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93)

南京豪利电脑技术公司激光照排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省地质测绘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5 字数:438千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305-03063-5

B·170 定价:34.00元

(南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

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22页。

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

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②，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

①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3页。

②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41页。

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

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

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是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写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

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内 容 简 介

惠栋和他的祖父惠周惕、父亲惠士奇是清代著名经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和哲学家。惠氏三代传经，为创立清代经学的吴学学派作出了重要贡献，惠栋则是相对于皖学的吴学首领。本书探究了一代经学大师成长的人文学术和时代主潮，深入原著，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缕述惠栋在《尚书》学、《诗经》学、《三礼》学、《春秋》学、《易》汉学、史地学、语言文字学等领域内的重要贡献，剖析其经学思想、语言文字学思想、哲学思想等，一言以蔽之为学术思想和科学逻辑思想，并及寄寓其中的政治思想，人生追求和社会理想。全书力图从门类科学的方法和法学，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述和评析惠氏的经史小学和考据学。

Abstract

Hui Dong of Qing dynasty was a famous scholar and philosopher who studied Confucian classics and Chinese characters. His grandfather Hui Zhouti and his father Hui Shiqi also studied these subjects. All devoted to Confucian classics, the three generations of Hui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chool of Wu, a branch of Confucian classics study existing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Hui Dong was the leading figure of this school.

This book begins with an exploration of the study of humanities and the main current of the time that nurtured this master of Confucian classics; then by delving into his works and alternating between the concrete and the abstract, the book inspects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Shangshu, Shijing, Shanli, Chunqiu, Yi, to history and geography, and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After analysing his thoughts and philosophy on Confucian classics and Chinese characters, the book sums up Hui Dong's academic and scientific thoughts while paying attention to his views toward politics, life and society. Detailed abstracts can be found in each chapter, which by themselves can serve as a pocket edition of the book. The whole book attempts to analyse Hui Dong's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Chinese characters and his textual research using a scientific methodology illustrated by the methods of various disciplines.

序

郭维森

清代代表性学术是考据之学。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为纠正明末空谈心性之弊而倡征实之学。当时，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学术具有启蒙性质，故于前世经传之研究，往往择善而从，尚无汉、宋界阕。然既欲求真、求信，上溯往古，说经自不免侧重汉儒，实已开汉学先声。至清中叶，缘于文化高压，学者不敢多所发挥，于是偏至发展考据之学，以其宗汉，又称汉学。学者继承清初征实学风，以考证事实为鹄的，以“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为根本方法。因对经书追根穷底，故研经而旁及古代之天文、地理、典章、制度、文字、音韵、训诂等等。考据之学以其开拓之广、方法之进步，影响一代学风，是不能不予以足够重视的。

汉学全盛时，有吴学、皖学之称，开吴派者惠栋，开皖派者戴震。李开教授既已完成《戴震评传》，今又作《惠栋评传》，汉学代表方成全璧。惠栋、戴震作为一代学人，家境均甚清寒，一

生中孜孜矻矻,学问是求,生活既少波澜,交游也难言广阔,为之评传,自然也只能以学术为主,所可言者,无非学术经历、学术成就、学术思想、学术影响等等。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有惠栋传,列举其著作及学术创获,不足五千字。惠栋再传弟子江藩于《汉学师承记》中,记述惠氏祖孙三人,也只有数千字。今李开教授所作评传,则有四十万字,可知这是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惠栋的专著,其于惠栋学术的方方面面均作出了详尽的阐述与评价。

前人曾指出惠栋与戴震之不同。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云:“惠尊闻好博,戴深刻断制,惠仅‘述者’而戴则‘作者’也。”也就是说戴震较多己见,思想内涵比较丰富,而惠栋则笃信汉儒,考证博洽。章太炎也认为有此不同,而以地域环境解释之。惠栋学术特点,条分缕析,多是一字一句的考证,较少系统性。故前人评议,大都强调其引据确实,不作空言,一字一句,具有渊源,于“汉学”有彰微继绝之功,因许为“汉学”功臣(见《四库全书总目》惠氏著作各条)。《惠栋评传》则大大超越了这种评价。《评传》从大处着眼,将其零星考据之资料条而贯之,并于每节之前冠以提要,从而发明其知识、文化意义,发明其逻辑学方法论的价值,从具体考证中抽绎出某种概括性的结论。如第六章《易汉学》要论,第一节提要中说到:“惠栋易学是解释学和重知科学精神的逻辑发展”。第五节提要说到:“惠栋研究《易》学史的方法及其思想方法上的逻辑发展过程。”第九章惠栋的《论语》研究和世界观的特点,第一节提要说到:“孔子‘时中’论和惠栋对儒家辩证法的深刻把握。”如此等等,都说明《评传》作者是力图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发掘惠栋考据的思想价值的。力图指明其思想内涵,发掘其思想底

蕴。《评传》从思想史的角度，阐释了惠氏考据学的时代意义，指出其中包含的价值观念，寄寓的社会理想，从而强调其所具有的启蒙作用。这既符合本丛书的要求，在研究内容、方法上也是突破性的尝试，可以说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清代本有“汉学”、“宋学”之争，清之末世，更有今文经学派“对‘汉学’‘宋学’的批判，故而惠氏之学也迭遭批评。方东树《汉学商兑》竟讥之为“好学而愚，智不足以识真”，梁启超亦斥其“凡古必真，凡汉皆好”而评之为“功罪参半”。这种种批评虽未免过当，但“汉学”之缺陷亦不必为之讳。对清代考据学之成就，固应多所发掘，给以应有评价，但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对其局限性也应适当指出。这是我对本书的一点希望。

李开教授命序其书，不克获辞，聊缀数语，以为读后之感言，敬献此书之读者。

一九九六年十月

本书出版得到 澳门基金会 江苏省昆山市政府 资助